

白話  
白話  
二話  
一話  
十四詩  
詩  
品  
品



ISBN 7-80520-783-6



9 787805 207834 >

古典名著今译读本

# 白话诗品

[梁]钟嵘/原著  
郭晋稀/前言  
郭令原/注译

I 207.22/218

## 白话二十四诗品

[唐]司空图/原著  
郭晋稀 前言/注译



岳麓书社  
1997年/长沙

品诗四十二白

责任编辑 徐耕白  
封面设计 许康铭

诗 品  
白话 二十四诗品

原著 [梁]钟 嵘 (唐)司空图

译注 郭晋稀 郭令原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200,000 印张:9 印数:1-5,000

ISBN7-80520-783-6  
G·96 定价:12.00元

湘新登字007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
社址: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邮编:410006

2

# 白话诗品

原著/梁·钟嵘

前言/郭晋稀

注译/郭令原



。梁采婚未，“妾媵亲娘”心不，“照  
育衣。梁采帝先婚，梁采代婚也。卒以世不爵，帝先并土县二  
特，蒸天然安越室留胤何，灾暴共山，山邪苦留胤何士嗣；县籍  
不封前未聘婚者味必留胤何册册何。”《丽典基籍》，《梁室徽》封刺  
。来

前 言  
钟嵘，字仲伟，颍川长社人（今河南长葛）。他的生年，《梁  
书》本传，没有明确记载。但是永明三年，即公元 485 年，他进入  
国子学，根据当时规定，入国子学者，必须“十五以上，二十以还”  
永明三年，他应该二十左右了。上推 20 年，他是生在公元 465  
年。他在学期间，好学，有思理，明《周易》，为国子监祭酒卫将军  
王俭所赏识，荐为本州秀才。

他的《诗品序》说：“又其人既往，其文克定，今所寓言，不录  
存者。”书的中品有沈约，那么《诗品》写定，当在沈约死后。沈约  
《梁书》有传。死于天监 12 年，即公元 513 年，然则《诗品》成书，  
应在公元 513 年之后。  
钟嵘是颍川世家，是世代名公巨卿之后，自然有着良好的家  
庭文化教育传统。其兄钟岷，字长丘者，为建康令，著《良吏传》十  
卷。其弟钟屿，字季望者，为永嘉郡丞，曾参与编辑类书《遍略》。  
可见钟氏一家，是有著述条件和环境的。  
钟嵘的著作，除《诗品》为传世名作之外，还留有两篇书奏：  
一是建武三年（即公元 496 年），他上书明帝，建议“量能授



职”，不必“躬亲细务”，未被采纳。

二是上书武帝，谓不当以军功滥升清级，被武帝采纳。还有就是：隐士何胤隐居若耶山，山洪爆发，何胤居室独安然无恙，钟嵘作《瑞室颂》，“辞甚典丽”。可惜他的这篇颂和诗歌都未流传下来。

依本传记载，起家为南康王萧子琳侍郎，子琳被杀，改任抚军行参军，出为安国令。永元三年（即公元501年）改任司徒行参军。萧衍代齐建梁，为中军临川王行参军。天监三年（即公元504年），萧元简被封为衡阳王，任会稽太守，引钟嵘为宁朔记室，专掌文翰。后改晋安王萧纲记室，卒于官。史载萧纲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在天监十七年，（即公元518年），又在任仅一年，由可确定，钟嵘死于公元518年。《文心雕龙》成书，大抵在于502年左右，因此可知《诗品》成书较《文心雕龙》为晚。刘勰大抵生于公元467年左右，卒于公元532年，钟嵘死在刘勰之前。

所以钟嵘和刘勰所处的时代背景，大抵相同：一是魏、晋以来《周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之学，最为盛行，也是佛经翻译东来的时代；二是文学的地位，在宋齐时代提高了；三是宋、齐以来，文笔区分，更为明显；四声八病之说，最为倡盛。四是文学评论的著作，相当盛行。这些，在《白话文心雕龙》的前言中，已经论及。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同，刘勰则寄居定林寺，借助定林寺的藏书，于是论文叙笔，剖情析采，详论了十代诗文，有伦有序的总结了十代诗文的九次变化，写出了一部空前不朽的文学评论史。钟嵘以世代钟鸣鼎食的家庭，则依据家藏的文



史，将自汉以来的五言诗，加以论列，有总品，有各品，总品于历代诗艺既叙其大概，各品则分上、中、下之品第，详其源流，举其得失，窥索务广，而评鹭务精，这由于钟氏距汉京的年代尚近，闻见较今人为详，而宋、齐以来诸家，则多与之并世，濡染更深，故其书较后世徒资载籍而成者，为更精湛而更可信。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五言诗的专史。当然，钟嵘的品评，后之论者，也认为犹有偏颇失当之处。但是今天所传《诗品》，大抵都是依据的元延祐山堂考索本，千载传钞，讹脱已多，较之钟嵘旧作原书，失真之处在所不免。两汉至梁各家诗作，或则多佚，甚者荡然无存。用传钞讹误的《诗品》，并据各家残缺的诗作，以论钟嵘当年品评的得失，自然认为钟氏之作，不必允当也。但钟嵘《诗品》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，试列论如下。

### 一、认为诗是客观现实的反映：

现实有客观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，先谈自然现实，钟嵘认为首先是自然感触于人，人受它的感触，于是摇荡作家的性灵，作家也因为客观自然的风云变化，四时的代谢，于是思与境相结合，而成为诗。故诗可以动天地感鬼神。《诗品·序》云：

木草虫鱼，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，照烛三才，晖丽万有，灵祇待之以致飨，幽微藉之以昭告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……若乃春风春鸟，秋月秋蝉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

更重要的，当然还是反映社会现实。在社会现实中，人们所

接触到的，多半是生离死别，贫病老死，常常是人生的悲剧多于喜剧，晋、宋、齐、梁本是动乱的年代，又是一个朝代更迭最快的时代，人生的悲剧更多了。文学家是时代的脉搏，所以这段时期作家，多愁善感的作品很多。向子期有《思旧赋》，陆士衡有《叹逝赋》，潘安仁有《怀旧赋》、《寡妇赋》，鲍明远有《芜城赋》，江文通有《恨赋》、《别赋》，皆感慨悲哀之作。钟嵘也是深知这一点的，所以在他的《诗品序》中，认为社会现实的悲哀，是诗歌的最好素材。它说：

夫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苦之音要妙，欢娱之辞难工，而穷苦之言易好也。是故文章之作，恒发于羁旅草野。至于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；或骨横朔野，或魂逐飞蓬；或负戈外戍，杀气雄边；塞客衣单，嫖闺泪尽；又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扬蛾入宠，再盼倾城。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。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，非长歌何以骋其情？

这是专就社会现实的悲剧，与诗歌关系而论的。后来韩愈作《荆潭唱和诗序》，就发挥了这种意见：

夫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苦之音要妙，欢娱之辞难工，而穷苦之言易好也。是故文章之作，恒发于羁旅草野。盖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凡士之蕴其所共，而不得施于世者，多喜自放于山巅水崖，外见虫鱼草木，风云鸟兽之状类，往往探其奇怪，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，其兴于怨刺，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，而写人情之难言，盖愈穷则愈工，然则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工也。

其实钟嵘之论，则既说明现实中之愁苦，最能感动诗人，诗

人主观之愁怨亦最为动人啊。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人类的幽怨本自多于欢乐，自然界的缺陷本自多于完美，这就是悲剧之所以有其社会力量的必然规律。钟嵘如此之说，却道出了一个客观的真谛，即悲剧最为感人的美学根源。

## 二、提出了五言为诗之最有滋味者

五言之目，始自李陵，但是作者认为“古诗眇邈，人世难详。”五言诗文人创作步入诗坛，大体是东京末年。建安时，作家始盛。但魏晋时代，大家虽多，音韵天成，颇难句摘。到了宋、齐，作五言诗的更多了。名章迥句，时见乎篇。所以《诗品·序》说：“夫四言，文约意广，取效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便可多得。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习焉。五言居文词之要，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。故云会于流俗。岂不以指事造形，穷情写物，最为详切者邪？”

故诗有三义焉。一曰兴，二曰比，三曰赋。文已尽而意有余，兴也。因物喻志，比也。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。宏斯三义，酌而用之，干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彩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

以上的说法，是有道理的。语言文字的加繁，音节的增多，是诗的发展。由四言变为五言，音节增多了，指事造形，穷情写物，都较四言为详切了。再干之以风力，风情也深厚了，润之以丹彩，名章迥句，自然增多了。以五言对比四言来说，是当时诗之最有滋味者也。故诗之七言兴于唐代，自唐以后，七言遂逐渐代替四言五

言,这和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以五言代替四言,道理是一致的。诗的语言,发展到七言为句,尤其是绝律诗,就到止境了,再增多韵律平仄就难安排了,从唐到今,一千三百年之久,七言篇章的数目,已经超过五言而无不及,如果对今人来说:“七言之作,会于流俗,是众作之最有滋者也”,钟氏如果生在唐以后,也不会反对的。

还有宋齐以后诗赋都向抒情发展,两汉以来的大赋,虽然气势宏大,但是着重在京、都、江、海,于是便向物色哀伤发展,这是合于社会情感需要的。四言诗骚,重在政治事件,但是导泄私情,发抒个人苦闷,更是需要的,所以五言和辞赋一样,都向抒情发展了。所以钟嵘强调诗之三义,并且主张宏斯三义,干之以风力,润之以丹彩;所谓干之风力,即导泄私情,抒发苦闷;所谓润之丹彩,就是描摩风物,寄情山水,这才能使味之者无极,闻之者动心,是诗之至也;所以他说:“五言居文词之要,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。”

三、钟嵘论述了五言诗发生发展壮大的过程,五言诗在历史上的几个高峰和高峰时期的代表人物。

他以为五言诗滥觞于《卿云》、《夏歌》、《楚谣》,李陵《赠苏武》始著五言之目,于是出现了一批五言诗,但是这批古诗,人世难详,因为著名的辞赋作者,王褒、杨雄、枚乘、司马相如都没有

流传下诗来。从李陵开始到班婕妤为止，五言诗作者，只是男女各一人罢了。因此这批诗的作者和时代，都难肯定，只能说大抵是秦汉。到了东汉，历时两百多年，也只有一个班固，写了《咏史》，虽然是五言诗，却写得质直木讷而无文彩。

只有到了建安时代，曹氏父子笃好五言，平原兄弟，郁为文栋，加之刘桢、王粲为之羽翼，于是五言诗人辈出，成为五言诗的第一个高峰。

迄于有晋，三张、二陆、两潘、一左，颇能踵武建安，陆机为太康之雄，安仁景阳为辅，这是五言诗的第二个高峰。

永嘉年代，贵黄老，于是社会习气稍尚虚谈。及于江表，孙、许、桓、庾，也因循旧贯，诗文平淡无味，建安时代的风情气力不见了。迨后，郭景纯才力俊上，刘越石的气力清刚，并无法挽救东晋清的颓澜。到了义熙时代，谢益寿出来了；到了元嘉年代，谢灵运才能跨越刘、郭；陵轹潘、左；所以谢客为元嘉之雄，颜延年为辅，出现了五言诗的第三个高峰。

钟嵘既以此等高峰中诸家为五言诗之代表，文辞之领袖，唯颜延之一人“喜用古事，弥见拘束”，列入中品外，其余皆属上品。益以班婕妤、阮籍、左思三人，班姬源出李陵，与刘桢、王粲相埒，阮籍源出《小雅》，谢客以为左思与潘岳诗，古今难比，故此三人，亦宜列入上等。

其次便以源出某某的大家，大纯而小疵诸人，列为中品：魏文源出仲宣，张华源出王粲，陶潜源出应璩又协左思风力，颜延之源出陆机，谢瞻、谢混、袁淑、王僧达源出张华，鲍照源出二张、谢朓源出谢混，沈约宪章鲍照，其余或为时人推重，或有名篇，或

传秀句，或有特长，诸为中品。其余上品中品之外，凡当时有五言诗存，其姓名不可冥灭，皆诗中才子，总归下品。

或有议者曰：凡一代诗人之冠，皆列上品宜矣。若上冠冕诗人之辅，都归上品，颜延之为谢客之辅，犹入中品何也？今按：说见下条：“钟嵘品诗，不重用事。”故以颜为中品也。又鲍照、陶潜，品评极高，谓“鲍总景阳、茂先、谢混、颜延四家而擅美，跨晋、宋两代而孤出”，谓陶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，而并入中品，不入上品又何邪？盖鲍照“才秀人微”，不如曹、陆、谢客，门品既崇，众望所归，诗又“不避危仄，颇伤清雅”，陶潜亦门第不崇，诗亦质直，故同列中品，不入上品。至于曹公下品者，魏武“古直、悲凉”之作，并非五言，多在四字，故屈为下品。况序言亦云：“至斯三品升降，差非定制。”盖人之评品，各有着眼点，然中品之中，在当时多为大宗，亦如上品，既论其宗流；惟门第稍低，诗略有小疵，不如上品而已。

四、钟嵘品诗，不重用事。

夫属辞比事，乃为通谈。若乃经国文符，应资博古，撰德裁：驳奏，宜穷往烈。至于吟咏情性，亦何贵于用事？“思君如流水”既是即目；“高台多悲风”亦惟所见；“清晨登陇首”，羌无故实；“明月照积雪”，讵出经史？观古今胜语，多非补假，皆如：由直寻。颜延、谢庄，尤为繁密，于时化之。故大明、泰始中，

文章殆同书钞。近任昉、王元长等，词不贵奇，竞须新事，迹来作者，寢以成俗。遂乃句无虚语，语无虚字，拘挛补衲，蠹文已甚。但自然英旨，罕值其人。词既失高，则宜加事义。虽谢天才，且表学问，亦一理乎？  
 诗是吟咏性情的，不贵用事，是合理的。后来文论家，承此之后，常常提到这个问题。

唐释皎然作《诗式》，就说：

诗有五格：不用事第一；作用事第二；直用事第三；有事无人，无事第四；有事无事，情格俱下第五。  
 他又提出诗有四离：虽有道情，而离深僻；虽用经史，而离书生。宋人严羽作《沧浪诗话》说的更周密，而且因此批评了苏黄、四灵和江湖诸派。他说：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；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然不读书不穷理亦无以至其极。  
 他因苏黄好以才学为诗，批评道：盛唐诸人，惟在兴趣，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，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近代诸公，乃作奇特解会，遂以文字为诗，以才学为学，以议论为诗。……且其作多务使事，不问兴致；用字必有来历，押韵必有出处，读之反覆终篇，不知着到何在？……至东坡、山谷始自出己法以为诗，唐人之风变矣。山谷用工尤为深刻，其后法席盛



行，海内称为江西派。当然在诗中掉书袋，堆砌古事，是不好的。但是四灵、江湖之弊，以为诗人不必读书，不必穷理，也是错误的。所以严羽又说：

然不读书，不穷理，亦无以至其极。就是借此并纠江湖、四灵之弊。（予另有《诗辨新探》，可以参考）

### 五、钟嵘也不同意永明诗人的强调声律。

在永明以前，四声还没有完全发现，由于诗不篇篇配乐，人们才逐渐发现了四声，出现了诗调平仄的问题。诗歌配乐讲求律吕宫商，和诗调四声，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四声发现之后，怎样把四声和律吕宫商联系起来，在事实上是很难分辨清楚的，所以四声初起，并非人人所能辨也。若八病之说，更滋繁杂，近体绝律规律之生，梁陈隋尚在蕴酿之中。日人遍照金刚的《文镜秘府》，记载当时讨论，其初并不能如唐宋人作绝律诗有一定规则。要几经摸挲，才逐渐定下来。所以四声八病之说，钟嵘非之，此中不无道理。他所反对的，只是“襞积细微，专相陵驾，使文多拘忌，伤其真美”。他还是赞同“清浊通流，口吻调利”。正如刘勰所说：“左碍而寻右，末滞而讨前”，还是要求：“声转于吻，玲玲如振玉，辞靡于耳，累累如贯珠。”意见还是一致的。

最后，我想就便提提本书这次的注释，令原于此，是下了很大的努力，有不少处是值得读者重视的。如钟嵘以为古诗源出国风，注引沈德潜之说，沈说极为扼

要,不再补充了,是合理的。至于钟说曹植之诗,“源出国风”,“情兼雅怨”,旧注各家,未能结合陈王身世,令人不能透彻理解。今原注云:“林氏之缘文附注”皇来本。“林氏之缘文,系叔文章一语也”。《毛诗序》曰:“是以一国之事,系一人之本,谓之风”。曹植与曹丕互为兄弟,其诗以兄弟情分言君臣之事,题材近于国风。

尚未见其贴切也。再注情兼雅怨,甚得昔人著书之旨:

“《雅》怨”,《孟子·告子下》:“公孙丑问曰:‘高子曰:《小弁》,小人之诗也’。孟子曰:‘何以言之?’曰:‘怨’。曰:‘固哉,高子之为诗也!有人于此,越人关弓而射之,则已谈笑而道之;此无它,疏之也。其兄关弓而射之,则垂涕泣而道之;无他,戚之也。《小弁》之怨,亲亲也。亲亲,仁也’”。曹植自从曹丕即位以后,一直受到迫害,在诗中也表现怨恨之情。因为他和曹丕是同母兄弟,这种怨恨之情不是愤怒,而是沉痛,真所谓“垂涕泣而道之”也。曹植《七步诗》曰:“煮豆持作羹,漉豉以为汁。箕在釜下然,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”。正表现了这种情感。此外,如其代表作《赠白马王彪》,亦如此。《雅》怨即《小弁》之怨。《小弁》是《小雅》篇名。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所谓“小雅怨悱而不乱”亦从此义来。

注“文论”之难,不难于字词释义。在于论述义理,使之源源本本。又难于疏释文章源流,各家派别。

又本书品评各家,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,钟氏或一条,或数人一目,作者自有用心,注者皆未加条理,为之说明。今令原注释,